



# 关沮口怀故

## ——田园调查手记之八·长湖

□ 叶继程

荆江之北、长湖之南，有地名关沮口。古称关渡口，一字之易，尽显荆楚水乡的地理脉络。关沮口的地名，不是凭空而来，更不是当下所谓诗人意淫“关关雎鸠”的考证，而是山河形胜的原始隐喻，是水土相契的自然成就。清乾隆《江陵县志》载：“关渡口地处古沮漳河，长湖出口，势若关隘，故名。”寥寥数字，道尽地名本源。古者名“关渡口”，清简直白，尽述其形其用；后世易“关沮口”，融水入名，更显其韵其魂。清代以前，方志典籍皆称“关渡口”，光绪《荆州府志》始见“关沮口”记载，一字之变，是民间口语的自然流变，更是水土相依的文化认同。清末以降，虽河口淤积，渡口未废，“关沮口”之名流传百年，关沮镇、关沮村亦因之得名，成为江汉平原地名文化中“因形定名、因水赋魂”的典范，与杨林口、习口并称长湖三津，共守江汉水乡千年水运福泽。

关沮口的底蕴，远不止于地理形胜，更在于深埋的楚文化根脉，是楚人先祖踏足江汉的第一方热土。今人考证，春秋时期（公元前7世纪）楚莫敖屈瑕的封地，便在关沮口、凤凰山、孙家山一带，而屈瑕，正是战国晚期（公元前3世纪）爱国诗人屈原的先祖。屈瑕为楚王宗亲，任楚国莫敖之职，开疆拓土，战功赫赫，曾平定权国，攻破绞国，为楚国称霸江汉立下汗马功劳。一骑绝尘，猛将如斯，将楚旗插在关沮口，让这片湖河交汇处，成了楚人早期经营江汉的核心据点。

楚简有云：“昔我先出自颍项，宅兹淮、章，以还迁处。”沮漳河畔，是楚人最早的安居之地，关沮口作为沮漳河与长湖交汇之所，自是楚人繁衍生息的要地。屈瑕封地于此，让关沮口浸染楚人的血性与智慧；屈原先祖居于此，让这片水乡埋下楚骚文化的种子。而关沮口于战国晚期楚顷襄王元年（公元前298年）的屈原而言，更是故乡的门扉，归途的尽头，是流放路上最痛的回望。

楚水汤汤，烟波渺渺，屈原遭奸佞二次构陷，被逐郢都，开启第二次流放江南之路，一叶扁舟载满悲愤，沿沮漳河而下，途经关沮口。此间是楚地腹地，先祖封地，亦是早年踏足的故土，抬眼望，沮漳水悠悠，长湖烟波渺渺，西岸郢都城郭依稀，乡音随风入耳，怎不让他肝肠寸断。伫立船头，他回眸久久不肯肯前，目光所及皆是故国山河，心中所思尽是家国社稷。风萧萧，水茫茫，渡口渔火映着他鬓边霜雪，湖面涟漪漾着他无尽哀愁。他叹怀王昏庸，惜楚国危亡，悲自身遭厄，字字泣血，句句断肠，将对故乡的不舍、对家国的眷恋，悉数融进海子湖的烟波里。这是屈原与楚地故土最后的对望，关沮口也因这抹悲怆身影，浸染了千年不散的楚骚悲情，多了一份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苍凉与执着。

楚人的悲喜在关沮口交织，壮士的悲歌亦在此“口”回荡。伍子胥，这位春秋末期楚平王七年（公元前522年）与楚地有血海深仇的忠烈之士，其离楚逃亡的悲壮，亦与关沮口紧紧相连。

楚平王七年，楚平王昏庸无道，听信费无忌谗言诛杀伍奢、伍尚父子，伍子胥身负父兄血海深仇，星夜仓皇离郢，途经此口。他乔装改扮，昼伏夜出，心惊胆战唯恐被擒。立于关沮口渡口，他回望郢都，泪眼婆娑，父兄冤魂犹在耳畔，故国山河却已难容其身。他恨楚平王残暴，怨楚

廷腐朽，悲父兄惨死，怒自身无力，一腔悲愤化作仰天长啸，震彻长湖两岸。那一刻，关沮口的风是刺骨之寒，瓦子湖（长湖古称）的水是断肠之泪。伍子胥在此登舟，挥别故土，自此踏上借吴伐楚的复仇之路，留下“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白头”的千古悲歌，也让关沮口渡口，刻下壮士断腕的悲壮印记。

后世宋儒张弮守荆州，以伍子胥仇楚，不宜祀于楚地，移其神位出马伏波庙，正是深知这段血海深仇，不忍让壮士悲魂再扰楚地安宁。而关沮口因春秋末期楚平王七年（公元前522年）伍子胥的匆匆一渡，平添铁血悲情，让这片土地，在楚韵温婉之外，多了一份壮士断腕的刚烈，存了一份“鞭尸三百”复仇的注解。

若说屈原的回望是悲，子胥的离去是壮，那关沮口的驻留，便是关沮口最炽热的英风。荆州为关公镇守之地，东汉末年建安年间（公元209—219年），关公守荆十载，励精图治，深得民心，关沮口的海子湖（长湖别称之一），便是其操练水军的重要场所，民间关公设渡、练兵、垂钓的传说，为关沮口添了一页浓墨重彩的三国华章。

湖阔水长的关沮口，地势险要。相传诸葛亮致书关公，嘱其“骑兵胜曹操，水兵超东吴”，关公深以为然。荆州水网密布，无水师则难守疆土，他遂率麾下北方子弟赴海子湖操练，众人不识水性，关公治军严明，不惧日晒夜露，日日督战，九九八十一天不辍，终将将士脱胎换骨，习得驾船排桨之术，水师战力大增，成荆州防务中坚。

为便练兵往来，关公于长湖水口设渡口、筑码头，此地成水军往返要道，百姓感念其恩德，直呼此渡为“关渡口”，这便是关沮口古名的民间由来。此说虽无正史详载，却在荆州民间代代相传，《荆州三国传说》亦有收录，让“关”字既有地理之隘，更有英雄之名，让关沮口地名，多了一份忠义千秋的英雄气。

民间更有诸葛亮观阵试渡的佳话。关公练兵之时，诸葛亮自江陵赶来观阵，于凤凰山亭中远望，见海子湖上战船列阵，将士奋勇，心中甚慰。观毕欲渡湖，仅唤二兵撑舟随行，船离岸不远，诸葛亮作法起风，刹那间乌云密布、巨浪滔天，船身颠簸欲倾，二兵却临危不乱，稳舵划桨，安然渡岸。诸葛亮抚掌大笑：“关公水师，可御东吴矣！”这则传说，既见孔明神机，更显关公练兵之效，让关沮口渡口，成三国智慧与勇武交融的见证。

岁月流转，朝代更迭，关沮口渡口，既见证文人悲怆、壮士刚烈、英雄主义，更孕育贤臣壮志、流淌文人诗意。张居正，江陵人氏，明代嘉靖、隆庆、万历年间（1525—1582年）内阁首辅，救时宰相，明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秋，其省亲毕自江陵北上回京复职，途经关沮口，一腔壮志豪情，为这片土地添了治国安邦的雄阔气象；而袁中道，字小修，公安三袁之老三，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重阳节后，泛舟过关沮口，入长湖百里烟波，挥毫写下千古绝唱，为这片楚水热土，添了清逸隽永的文墨香。

此时的关沮口，已是荆楚要道，舟楫云集，商贾往来，一派水乡繁华。张居正年少离乡赴京，宦海沉浮数十载，心系故土，每逢省亲必经关沮口。他舍舟登岸，驻足远眺，沮漳河奔涌东流，长湖烟波浩渺，楚地山河尽收眼底。回望平生仕途，

朝堂风云变幻，大明百弊丛生，百姓疾苦历历在目；远眺故土荆州，物阜民丰却藏治理积弊。

此间为楚地门户，江汉咽喉，一河通南北，一湖连四方。立于关沮口渡口，张居正心中感慨万千，一股改革图强、济世安民的雄心壮志油然而生。他深知，荆楚为天下腹心，江汉安则天下安，唯有革新弊政、整顿吏治，方能让百姓安居、大明长治。关沮口的清风，拂去他宦海疲惫；沮漳河的碧波，激荡他报国热忱。他在此稍作停留，听乡音、感乡情，更坚定了改革的决心，旋即启程赴京，重入翰林院供职，而后大刀阔斧励精图治，以一腔楚地风骨与报国抱负，撑起大明半壁江山。

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重阳节后，秋高气爽，湖光澄澈，从玉泉山寂居归来的袁小修，自草市泛舟过关沮口，见碧波浩渺，秋阳映水，一鹤入水，触景生情。思千年楚地兴亡，感陵谷沧桑巨变，写下《由草市至汉口小舟中杂咏》千古名句：“陵谷千年变/川原未可分/长湖百里水/中有楚王坟”。寥寥十六字，道尽湖泊千年沧桑，写尽荆楚故国幽思，更为“长湖”之始名。陵谷更迭，山河易貌，唯有长湖百里碧水悠悠。这五字四行从关沮口的湖光烟雨中走来，凝乡愁于砚墨，让长湖碧波，不仅载史、载义、载志，更载诗，也让关沮口的文脉，多了诗词歌赋的温润绵长，成荆楚大地诗与史交融的千古绝唱。

岁月无情，山河易貌，关沮口的沧桑，终究落进了人间烟火，刻进了我的生命记忆。一九七零年，秋风萧瑟，草木含霜，遇家庭变故，我乘舟自新阳村西渡长湖，绕摇关沮口，篙撑黄贝口，桨绕园子湖夹沟，归至父亲的渡口，关沮口渡口。彼时的关沮口，渡口犹在，橹帆未歇，尚有余韵，大船渡波，仍自长湖运往开来于沙市便河与荆州黄水。桨声欸乃，漾开长湖千年的故事，也载起父母仓皇的归途。

未及两载，山河再变。一九七一年底，太湖港改造，人力筑土坝封堵长湖通沙桥门、便河的河道，千年渡口的水运之魂，戛然而止。山河的变迁，总与人生的悲欢交织。一九七二年初春，寒意料峭，神志不清的母亲，将襁褓中的么妹弃于桂香街舅家。是夜，星月光，舅舅舅妈携二哥执灯笼火把，踏破夜色叩门回路，从尚未筑实的坝脚，淌淤泥、涉浅滩，将三个月大的么妹送回茅顶土墙的家门。那一点摇曳的灯火，穿透夜雾与淤泥，暖了半生寒凉，成了我心底永不熄灭的光，也让关沮口的沧桑，多了入骨的人间温情。

曾经的关沮口，是舟楫云集的津渡，是商贾往来的要道，是水军操练的疆场，是贤臣驻足的驿站，是诗人咏叹的胜境，也是游子还乡的渡口，亲人相守的见证。晨有橹帆如云，暮有渔火点点，沮漳河碧波，曾载着春秋楚人的舟楫、东汉三国的战船、战国屈原的悲思、春秋子胥的壮行、名臣张居正的宏志、“三袁”袁小修的诗行，也载着渔人的醉艇、回家的橹帆。而今的关沮口，渡口不在，长桥卧波。长湖水波依旧，只是难觅半舟片帆。唉！俱往矣。

湖水悠悠流淌，烟波岁岁年年。关沮口的故事如一册尘封典籍，书写着水乡的地理脉络，笔注着楚地的文化基因，也隐藏着我半生的悲欢与眷恋，敬待读者诸君随缘翻阅一笑。浮生踪迹皆萍水，唯有乡愁照古今。

### 活化楚都大家谈

## 江汉「握手」，一条运河的二十六个世纪

□ 张卫平

初冬时节，站立在引江济汉工程那开阔的渠首，看着滚滚江水，浩浩荡荡，思绪一下子飞到了沙洋。我想，这是一次跨越二十六个世纪后的又一次“握手”。当日光顺着这清澈的人造洪流追溯，水波便开始荡漾、泛黄，倒映出2600年的云影天光。

风云的开篇，源于春秋的激荡与一项石破天惊的创造。楚国令尹孙叔敖，在改善楚国的水运航道上大胆开拓，构建了以楚国都城郢都为核心的水路交通网。在楚庄王的鼎力支持下，孙叔敖主持修建的水渠将长江支流沮水与汉水支流扬水连接起来，巧妙地实现了长江荆江段与汉水之间最短距离的联通。

“通渠汉水、云梦之野”。一条全长约86公里、连接沙市长江与沙洋汉江的扬水运河，横空出世。这条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，以区区30余公里的开凿河段，奇迹般地取代了原本需要绕行近740公里的漫长水路，堪称古代水利工程的奇迹。这，无疑是长江与汉水在历史记载中的第一次“主动握手”。尽管，这次“握手”，带着初创的粗糙与试探，却已撼动了地理的既定格局。正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贾海燕所言：“‘云梦通渠’的出现，标志着我国古代人民改造利用大自然的伟大进步，体现了楚人非凡的开拓进取精神。”的确，楚人开凿的扬水运河，比吴国沟通江淮的邗沟（后世称京杭大运河的一段），还要早上一百多年，在中国乃至世界运河史上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第一笔。

舟楫初通云梦泽，旌旗直指汉皋头。长江与汉水的首次“握手”，最初输送的，是青铜的冷光与战船的激浪，承载着楚国北图中原的雄心和轴重。纪南城的号角，经由这条新生的血脉，更加迅捷地响彻汉水之滨。这次握手，是楚国霸业的动脉搏动，亦是南北文明初次深度交融的温柔连结。

不过，在历史的蜿蜒的风云变幻，紧握的手，有时也会松脱。随着秦火焚散郢都的宫阙，扬水运河也随之黯然，河床几度兴废，逐渐淤塞于岁月与南迁的云梦泽底。渐渐的，那次伟大的“握手”，似乎被流沙掩埋。直至西晋的船帆，重新连接起这段中断的情缘。名将杜预，镇守襄阳，他的视野超越了军事的藩篱。杜预“开扬口，起夏水”，疏浚扬水故道，“内泄长江之险，外通零桂之漕”，带动了运河沿线经济的发展。

于是，在扬夏运河的波光里，闪烁出一个统一王朝经营南国的深谋远虑。这可谓，是长江与汉水的再一次“紧握”，不仅为了泄洪减灾，更将帝国的神经网络“漕运”，从洛阳径直延伸至巴陵、零桂。江汉与襄阳之间的航程，被缩短了千里，朝廷的政令、江南的物产，在这条水道上一日奔流，维系着一个庞大帝国的体温。杜预凿渠纾水患，晋帆千里下潇湘。运河之功，可谓既安澜于当时，更续写了江汉交融的篇章。

“怒涛渐息，樵风乍起，更闻商旅相呼。”我们从北宋词人柳永的描绘中看到，漕运关乎国本，当旧道再次被泥沙淤塞，联系变得微弱之时，一个崭新帝国对南方财富的渴求，便化作了重新紧固这次“握手”的动能。北宋端拱元年，宋太宗下令开凿荆襄运河，仍是自江陵经潜江入汉水。1037年前，荆襄运河的开凿，是一次更为直接的“握手”。

太湖港的旧事，也被重新记起。三国时期，东吴镇军大将军陆抗“作大堰遏水”以拒羊祜的智谋，早已证明了这片水网的战略价值。此时，湖广、四川的粮米、绢帛，得以更为顺畅地溯流而上，注入开封的繁华。在运河桨声灯影里，交织着经济的命脉与文化的涟漪。沿岸市镇因之而兴，南腔北调在此汇聚。

明清之际，两沙运河的名号响起，更带了几分市井商贾的鲜活气息。沙市与沙洋，这两个因水而兴的码头，简写成了运河的名字，巧妙地串联起前朝运河的段落，借长湖之激港，成南北之通衢。豫、陕、鄂、湘、川，五省货物于此周转，运河成了黄金水道。“两沙运河”的这次握手，在民间贸易的润泽下，显得格外紧密而富有生机。

然而，清末一场沙洋李公堤的溃决，竟将四公里长的河道生生淤为平地。运河的东段，从此在地图上被抹去。持续了近2000年的“握手”，在自然伟力的反噬下，被迫松脱。

民国年间，“两沙运河”数次重开的蓝图，终究停留在纸面上，成为时代怅惘的注脚。直至孙中山先生在《建国方略》中，以宏大的笔触再次勾勒出江汉新运河的梦想，那份渴望重新“握手”的期盼，才为这条古老水道的未来，埋下了伏笔。

当风云再聚之时，已是当今之世。南水北调的国家战略，如同历史在新的维度上投下的巨大身影。这项当代最宏大的人工运河，轰隆隆地登场了。引江济汉工程，不是简单的“修复”或“沿用”，67公里的崭新渠身，部分依循着古扬水运河与“两沙运河”的旧梦，部分开创着前所未有的轨迹，这条缩短600多公里航程的黄金水道，滋润着千里沃野。昔年孙中山先生的蓝图，历经百年，化为现实。这次的“握手”，是对2600年以来所有尝试与梦想的一次盛大成式的致敬与超越。

从楚人孙叔敖以开创性思维，促成第一次“试探性的握手”，到西晋杜预、北宋曹司、明清商帮一次次或紧或松的“维系”，直至今日以国家力量实现的“坚定而科学的世纪握手”，一代代人面对的是不同的山河，怀揣的是不同的抱负，却都将目光投向了长江与汉水之间那一段地理与文明上的“渴望”。江汉运河，便是他们共同的答案。

这，便是一场跨越二十六个世纪的“江汉握手”。

二〇二六年第一期 总第一百九十二期
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168

# 文化荆州

### 翰墨荆楚⑤



忠厚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  
作者 黄文泉

### 楚史杂谈

## 宋西门之盟是春秋争霸史上的重要转折点

□ 余大中

公元前579年，在宋国执政华元的斡旋下，晋国大夫士燮与楚国公子罢、许偃，在宋国西门外缔结盟约，史称“宋西门之盟”，又称“华元弭兵”或“第一次弭兵之会”。这场看似短暂的和平约，虽然只有一份百余字的盟约，而且仅仅只维持了四年时间，就因为郢陵之战而破裂，但却深刻改写了春秋争霸的历史轨迹，得到后世历史学家的普遍好评。

在春秋中期，晋楚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，晋公确立霸权；公元前597年，楚庄王通过郢之战反超晋国，从此形成晋强则楚弱、楚盛则晋衰的拉锯态势。持续半个世纪的军事对抗，导致中原诸侯苦不堪言。郑国采取“朝晋暮楚”的骑墙策略而被双方埋怨，宋国因为地处要冲而频遭战火侵袭，鲁国也因晋国索要汶阳之田而心生怨怼。据《左传·成公十七年》记载，公元前583年，晋景公将汶阳之田割与齐国，直接引发鲁国不满，形成诸侯贰于晋的连锁反应。

楚国方面，庄王去世后，楚共王年幼继位，子重、子反等权臣争权夺利，申公巫臣叛逃引发吴国崛起，形成吴楚争衡新战场。楚国不得不分兵抵御吴国的侵袭，导致对晋作战能力大幅下降。晋国则面临内部卿族专权危机，赵氏、栾氏等家族势力膨胀，晋厉公不得不通过联姻、

会盟等手段稳定局势。在内外交困形势下，晋楚双方都意识到，持续对抗只会两败俱伤，和平试探成为一种必然选择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宋国执政华元，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，而且与晋鲁、楚子重均有私交，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契机，主动承担起斡旋的使命。据《左传·成公十一年》记载，华元先是赴楚国说服子重，然后又转道晋国劝说栾书，最终促成晋楚代表在宋国西门会盟。早在春秋时期，这种第三方的军事调停，应该是开创性的举措，可以说是后世合纵连横外交策略的雏形。

宋西门之盟的盟书虽然简短，却蕴含丰富的政治智慧。载于《左传·成公十二年》的这份盟书，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：其一，盟书规定“凡晋、楚无相加戎”，以此禁止双方直接军事对抗；其二，盟书要求“好恶同之，同恤灾危，救备凶患”，约定在灾害与外敌面前共同行动；其三，盟书提出“交贖往来，道路无壅”，从而保障使节往来无阻；其四，盟书强调“有渝此盟，明神殛之，俾失其师，无克胙国”，这就是发誓，以神权来约束双方的行为。

后世史家对宋西门之盟的评价颇高。《楚史》称其为春秋弭兵运动的先声，《左传》则以西门之盟为典故，象征诸侯和好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盟约缔结后的

四年间（公元前579—公元前575年），晋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。直至公元前575年，郢陵之战爆发，盟约虽然破裂，但战争频率较此前已显著下降。文献资料统计显示，公元前579年至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之会，晋楚大规模会战只有二次（即郢陵之战、湛阪之战），而此后的八十年间，仅仅见于史册的大规模战争就超过了五次。

学者普遍认为，宋西门之盟的历史意义，关键在于从军事对抗到外交博弈的转型，为中原地区带来了喘息之机。郑国等中小国家利用这段和平时期，休养生息，发展经济。据《史记·郑世家》记载，公元前585至公元前571年，郑成公在位期间，不得晋国可以真正做到朝晋暮楚，两不误，既避免战争损失，又维持国家独立。

学界特别强调，宋西门之盟更为深远的意义，在于盟约确立晋楚分霸而治的格局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外交智慧和制度模板。这种晋楚双霸权模式，打破了此前的单极霸权，形成晋治北方、楚控南方的局面。在此前提下，郑国贰于晋却仍然维持与楚国的表面合作，鲁国虽然对晋国不满但仍需参加瑛泽之会。宋西门之盟虽然在郢陵之战破裂，但是这种格局的影响却还存在，甚至可以说持续到了战国初期，三家分晋、田氏代齐之后，才逐渐瓦解。